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人文珍藏

2011中国年度随笔

杜渐坤 陈寿英 主编

王 蒙《秋水的余响》

苍 耳《切尔诺贝利：他依然没有撤离》

董少东《肃贪首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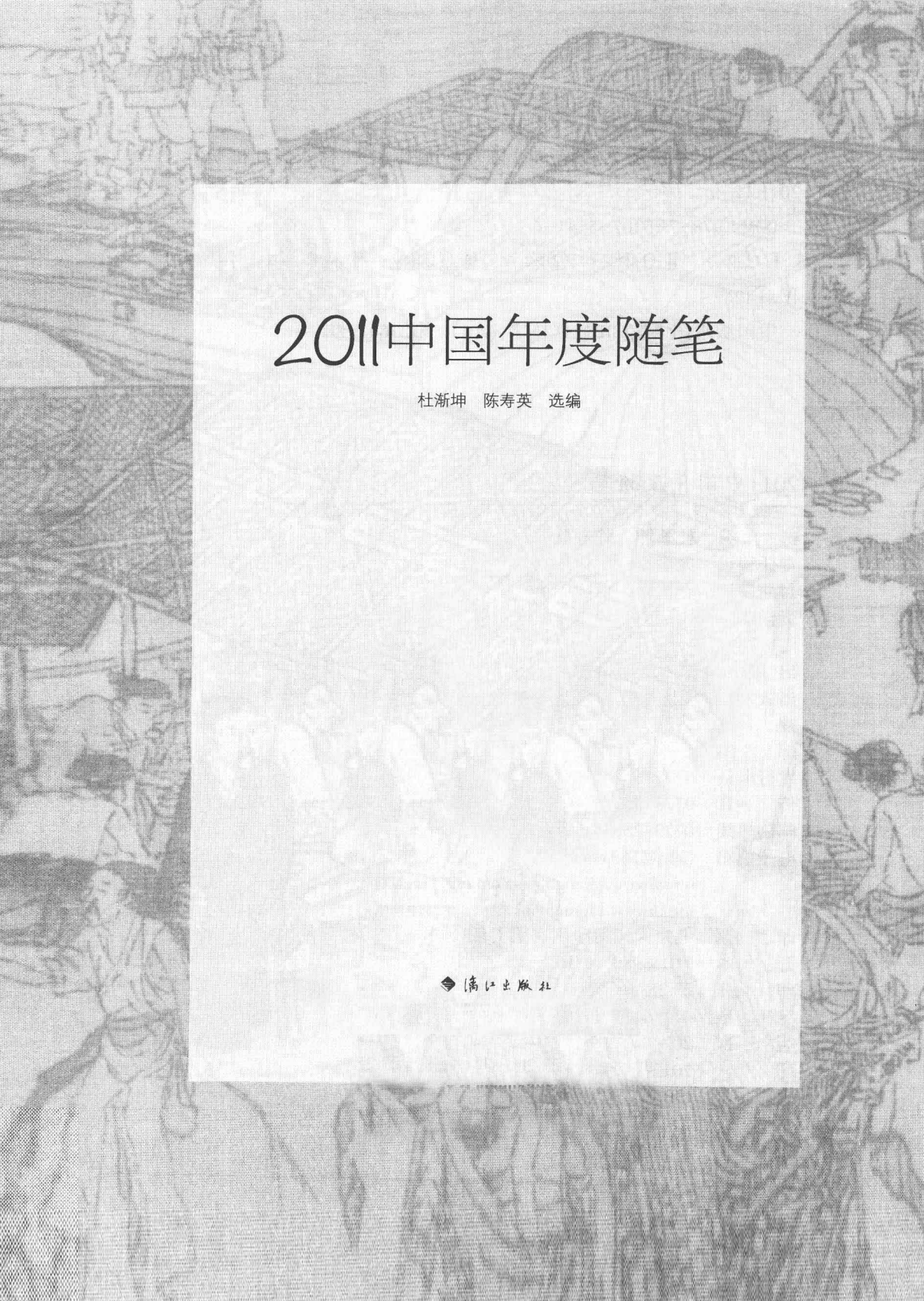
傅国涌《赴死，只为寻求更公正的社会》

邵燕祥《蔷薇叶子》

范 曾《城市与收藏》

漓江出版社

◆ 漓江出版社



2011中国年度随笔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1中国年度随笔/杜渐坤,陈寿英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07-5541-6

I. ①2… II. ①杜… ②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76017号

2011中国年度随笔

选 编 杜渐坤 陈寿英
责任编辑 庞俭克 曹 萍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411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541-6
定 价 3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不再要广岛！	陈 言 (1)
切尔诺贝利：他依然没有撤离	苍 耳 (10)
思危方能安居	
——谈“福岛次生效应”、切尔诺贝利灾难及中国民生安全文化	鲍 鸥 (16)
神社招魂“靖国”难	赵 刚 (22)
重说道德	韩少功 (31)
“国学”的迷思	王小林 (41)
鲁迅：中国人有信仰吗？	魏韶华 (53)
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	张汝伦 (59)
悠着点，慢着点	
——“贫富与欲望”漫谈	莫 言 (66)
肃贪首案	董少东 (71)
知识分子的权力、责任和义务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批判性人文主义的谱系》读札	丁 帆 (85)
革命：摇晃的中国	张 鸣 (93)
《叫魂》：谎言里的真实	马瑞洁 (99)
赴死，只为寻求更公正的社会	
——黄花岗英烈百年祭	傅国涌 (104)
知雄守雌的可食之“粒”	
——粮食与文化	任林举 (110)
茶叶贸易与中国近代化	周牧之 (130)
帝国被慈禧终结	朱维铮 (139)

秋水的余响	王 蒙 (165)
文人的风节	李国文 (168)
只爱娥眉不爱官	
——艳事背后的政治阴霾	黄 波 (177)
丈夫不能再辱	
——李陵评传	许 晖 (185)
千古文章未尽才	
——清诗之旅	李元洛 (209)
寒冬早行人	王充闾 (222)
隐士与叛徒	王开林 (230)
从己的奥秘说起	刘心武 (242)
忽然想到	陈四益 (248)
蔷薇叶子 (外二篇)	邵燕祥 (262)
说话集	阎 纲 (274)
一块土地	贾平凹 (297)
极乐的爆竹	张承志 (303)
敲响城门的远方乡党	陈忠实 (309)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王 尧 (314)
杂感八则	穆 涛 (318)
神仙太寂寞	陈思呈 (327)
仙履	周晓枫 (343)
鸟巢	
——自然笔记	杨文丰 (349)
城市与收藏	范 曾 (356)
带着“落花”回家	阿 来 (361)

不再要广岛！

陈 言

—

No more, Hiroshima! 这是1982年“呼吁废除核武器、缩减军备”的东京反核行动中最响亮的口号，日文的语境不作翻译，直接用片假名ノーモア・ヒロシマ表示，直译成中文则是“不再要广岛！”从作为“二战”期间日本重要的军工基地，到成为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战场，从轰炸后默默忍受日复一日的深重痛苦，到美国解除对日本的占领和审查，从而使得这块土地终于发出痛彻肺腑的呐喊，广岛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它负载着太过沉重的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内涵：以“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控诉核轰炸造成的惨绝人寰之象，并且在此基础上希求废除核武器、追求和平；呼吁人类的尊严高于一切，格外珍惜发自善良人类灵魂深处的文化遗产。故此，No more, Hiroshima! 的含义是“不允许广岛悲剧再演！”或者“不再要原子弹！”

沿着这一内涵，“广岛”还衍生出一些相关概念，如“广岛的心”、“欧洲广岛”等。“欧洲广岛”这个词的日语表达是オイロシマ，它源自英文 Europe 和 Hiroshima 两词的合成 Euroshima，意指欧洲的废除核武器、诉求和平之地，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反核”运动浪潮中。1981年以西德反核作家汉斯·派塔·布鲁尔斯访日为契机，有过核轰炸的惨痛经历的日本也掀起反核、反战、诉求和平的浪潮。1982年1月，以中野孝次、大江健三郎等为核心，三十多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控诉核战争危机的文学家声明”，接下来有超过五百位文学家签名；后来发展成为两千万市民的签名活动；到了次年5月，大概三十五万市民参加了反核运动的集会。

针对这场战后日本文坛自发形成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以及运动中将反核武

器/战争与反核能开发、反日美安保条约联系在一起的特征，被誉为“战后思想界的巨人”和“独立思想家”的吉本隆明提出尖利的批判。他的理念在自己的《“反核”异论》（1982）一书中得以充分阐释，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吉本认为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欧洲反核运动受到了苏联的利用，是苏联依靠非核军事力量来镇压波兰的遮羞布，只反对美国的核而不反对苏联的核，缺乏批判的正当性。据此，吉本声称自己要做的就是对充满欺瞒、党派性极强的反核运动进行反“反核”。但他忽视了欧洲反核运动中试图脱离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支配、寻求独立的愿望。二、吉本指出：由战争引起的死亡，不论是无意义的，还是被强制致死的，任何方式的死亡具有同等意义；对于和平运动而言，仅仅通过具有特别意义的死来考量战争本质的做法是错误的。他想要阐明的是，由战争引起的死亡中，不应该特别强调死于核轰炸，这样做会遮蔽战争的本质，有掩盖现代战争中不依靠核武器的战争和侵略的实态的危险。三、吉本嘲笑那些将“反核”与“反核能开发”相提并论的人，他认为，说到“反核”的“核”是指“核武器”或者“核战争”，作为核武器或者核战争的“核”，就是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经典的《战争论》中也只是被视作非常手段的“政治”问题；而“反对核能开发”所说的“核”，其本质是核能的开发利用，即便牵涉“政治”，也始终是围绕处理手段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并非是针对核能本身的斗争。核能是与石油、碳同一维度的物质能源，是科学将其解放出来，这是核能的本质。政治斗争则无法涵盖科学对物质的解放意义。左翼在谈到“反核能开发”时，是将“科学”与“政治”混为一谈、不懂科技的反动伦理。吉本隆明还特别对黑古一夫进行批判，说黑古一夫认为连核能研究都不允许，这简直是中世纪的黑暗主义，实在愚痴狂妄。针对反核声明反复提及的“一旦发动核战争就将歼灭全球”的言论，吉本更是大加批判，认为核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声称这种科幻小说般的妄想只是煽动了人们的不安，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吉本隆明发表“反核”异论之后，招致文坛一片骂声，这让他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在一篇名为《停滞论》的文章开头，吉本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异常恐惧。我所恐惧的，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我必须清楚，由于我批判反核声明而遭到文坛的驱逐……这就是社会法西斯行径，很显然，（现在的文坛）与战争中的文学报国会是互为表里的。……我渐渐意识到，我要与日本‘旧左翼’和整个文坛为敌了。”

二

无论吉本隆明多么沮丧，现实告诉我们，那场“反核”运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日美安保体制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它所规范的日美关系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基石，日本在呼吁废除核武器的同时，依然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安然度日；吉本隆明对于“核战争”与“核能开发”截然分明的观点与日本政客和那些追求经济利润的实业家的理论合流，20世纪90年代以后加藤典洋等人对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逻辑也与吉本隆明的理论一脉相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海湾战争期间，加藤典洋对国内发表反战声明的文学家提出批评，指责反战声明所依据的“和平宪法”是当时盟军占领当局强加给日本的，表面上是在批判护宪派和改宪派而倡议修改宪法，意在批判护宪的左翼知识分子）。

问题是：“核武器”与用于和平的“核能”之间果真如吉本隆明所说的那样泾渭分明吗？

稍微了解一下相关知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像铀 235 和钚 239 这些容易引起核分裂反应的物质中，中性子由于发生核分裂的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核能。核武器与核能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会迅速发生核分裂的连锁反应，能量在瞬间释放；后者可以通过控制棒和冷却水来抑制核分裂的反应，从而将释放出的能量控制在发电用途上。不论是用于核爆炸还是核能开发，高纯度的铀 235 和钚 239 都是必需的。钚是通过铀浓缩和原子炉对使用过的燃料进行再处理来提取的，在已知的宇宙物质中，其毒性仅次于钋，一旦流入海底或土壤中，钚 239 会留存二万四千年，而钚 242 会存留三十六万七千年，将给环境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性影响。也就是说，制造核武器与开发核能的原料、技术手段相同，工作原理相同，只要掌握了原子炉操作的本领就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

日本正式启动核能开发预算是在 1954 年 3 月。其时美国开始转变对日政策，日本政府声称要和平利用核能；1973 年日本政府确立“跨越式发展核能”以保障能源安全的新举措；政府计划从 2005 年度起六年间建成二十座核电站。到 2011 年为止，日本拥有五十五座核反应堆，占全球总量的 10%。然而与此同时，因操作失误或技术不过关而引起的核泄漏事故时有发生。早在 1978 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 3 号机组就发生过临界事故；日本处理核废料的青森县下北半岛附近居民的白血病发病率达到全国水平的十倍；1999 年 9 月东京东北部东海村发生的核事故造成两人死亡、近百人受伤。尽管日本的法律规定要及时报告核事故，但报告常常不够及时，也不够详细，甚至出现瞒报、漏报、编造虚假数据

的现象。只要认真思考一下推进和拥护核能开发的隐蔽体制，就不能不让人担忧：日本通过再处理而提取的钚约四十吨，如果制造成核炸弹，可以制造五千发，其拥有量居世界第三位。表面上始终贯彻废核意志的日本政府，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并没有让人感觉到它在切实地去废核。就连日本有识者也在谴责：日本所谓的“和平利用”其实在为核扩散作大贡献呢。

对此，那些积极争取实现受核轰炸者援护政策的人视而不见；而政府不顾核开发存在的技术缺陷，一边在推进核能的和平利用，一边又探讨日本核武装的可能性。1967年12月佐藤荣作首相提出的“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却随着配合美国在西欧部署核导弹计划、正式同意美国在必要时派遣核潜艇进驻日本港口而实际上被突破。2008年12月，日本部分外交文书解密，日本政府对核武器所持的真正态度也随之曝光，这让我们知道，就在佐藤首相郑重其事地提出“非核三原则”的两年前，他初次访美，就向美国国防部长提出，一旦与中国发生战争，“期待美国立即向中国实施核武器报复”；同时表示，由于“海上不能立即发动进攻”，希望美军能带核进入日本。而在此番会面之前一天，在与约翰逊总统的会谈中，佐藤已经明确了寻求美国“核安全保护伞”的态度。日本认为，只要拥有核的中国存在，就有理由将“核保护伞”论正当化——而这种政治考量同样适用于朝鲜。1968年，美国、英国和印度签署《核不扩散条约》（NPT），日本虽然在1970年也签了名，但是国会迟迟到1977年才承认。其间美国就核燃料再处理问题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则在核能的民间利用方面保持顽强的战斗力，从而引发了“日美再处理战争”的外交摩擦。1997年《周边事态法》的出台，使日本名正言顺地成为装载核武器的美军舰船的后方基地。可见，“核保护伞”论与潜在的“核武装”论属于同一理论系统，日本政府对于处在“核保护伞”下的状态不断表示“很无奈”，而在其正式意见中也不否认“核武装”。就在3·11日本大地震之前两天的3月9日，《朝日新闻》还报道：石原慎太郎声称，为了对抗中国的威胁，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4月11日，一直积极推进核能开发与日本核武装的石原慎太郎第四次当选东京都知事，这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保守派推进核能政策的努力不无关系。

然而谁能想到，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大江健三郎等人并肩赴欧洲考察并且参与欧洲反核运动的也是这位石原慎太郎。谁能说，为了和平利用而控制核按钮的手就一定不会去按下用于核轰炸的按钮？

三

吉本隆明深谙日本政治的奥秘。1995年，在一篇题为《围绕法国与中国的核试验》一文中，他在仔细观察日本各界围绕法国和中国进行核试验之后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后指出：日本之所以严厉斥责法国进行核试验，而对同样进行核试验的中国的批评则显得暧昧游移，其历史原因在于：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而中国也明确表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现实的原因是：他认为虽然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在其宪法中明确标示非战、非武装的国家，但日本又明确表示要让自卫队合宪，派遣军队到卢旺达、柬埔寨等国，干涉他国内政；侵略战争的谢罪决议花哨而暧昧，对国内外遭受核轰炸受害者的赔偿敷衍了事，不对外国慰安妇进行谢罪赔偿，对殖民地民众的被害诉求也置之不理——日本的态度实际上是要使日本宪法第九条趋于无效，在一步一步向反动的、退化的道路迈进。

其实在反战、追求和平方面，吉本隆明与他曾经批判的对手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不同之处在于：他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来完成自己的论述的。而对于能够招致世界最终战争、让人类灭绝的核武器的这种灾难性后果，我想不仅仅需要逻辑推理，还需要面对“核时代”的现实政治，发挥核时代的想象力。

随着1945年8月6日广岛遭受核轰炸，核时代拉开了它的序幕：整个城市成了纳粹收容所的毒气室，变成得不到救赎、没有出口的地狱。企图蓄积更为庞大的核武器、开发和配备新式核武器、抑制核战争成为核大国、核保有国与非保有国不同的战略构想，人类在毁灭性的威胁中日复一日地存续。但是，要想将核轰炸这种神话般的巨大的恶化为普通民众的日常感觉，日益困难：它还没有发生，也许在个体的有生之年永远都不会发生，那么，有多少人愿意抱着恶魔般的恐惧日夜不眠？甚至连广岛人、长崎人对核轰炸的恐惧也日渐风化销蚀，而其中有不少人一直在努力试图忘却。还记得1949年负责起草和平纪念都市建设法的寺光忠在解释这部法律的精神时是这么说的：“要远离原子弹和8月6日。”

于是，发挥核时代的想象力，并且使其化为自己日常性感受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思想家和作家的身上。直接以广岛为题材并且终其写作生涯执著于“核时代的想象力”的，为数甚少。大江健三郎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让我们回到大江反核的原点。1963年大江的智障长子的诞生让他几近崩溃，他在写作中也找不到积极意义，陷入了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的危机。于是，他将儿子留在东京，自己前往广岛。在那里，他与不同类型的核轰炸受害者见

面、交谈，聆听他们痛苦的体验，陆续记录下他们与白血病、癌症等原子病魔抗争的故事；除了关注身体的损伤之外，他还揭示了受害者的婚姻、精神异常等社会问题，使广岛悲惨而痛苦的灵魂广为人知。而在与可怕的病魔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广岛原爆病医院院长重藤文夫等人在努力克服遭受轰炸的经历所带来的病痛中确立了各自独特的人之本性，大江健三郎称他们是有尊严的真正的广岛人，他们在努力向地狱填充人性要素。这些笔记在后来结集为《广岛札记》，由岩波书店出版。他对广岛问题的阐述异常丰富，在有限的篇幅内，笔者姑且将其主旨作如下归纳：一方面，广岛核轰炸是具有否定意义的事件，它完全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基本尊严，认为使用核武器是为了带来“真正的和平”的想法是错误的，应该追究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的责任和发动法西斯战争的日本的责任。另一方面，不逃避广岛，正面去接受不幸并且与之战斗，为了所有其他人而行动，才能为自己承受的屈辱附加上价值，才能在全面废除核武器的运动中发出最具根源意义的呐喊。总之，广岛就是人类最触目惊心的一块伤疤，人类康复的希望和腐朽的危险都将在这里萌芽。

如果说《广岛札记》的立足点在于彰显“人性的尊严”，那么进入1968年之后的大江则着眼于现实政治批判。从日本国家核政策实施的角度来讲，196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佐藤首相在众议院会议上发表了四项基本核政策，既要坚持“非核三原则”，又要依靠安保条约实现对美国核抑制力的依存；既强烈呼吁废除核武器，又将核能的和平利用作为最重要的国策推进。大江看穿了日本政权的虚伪，在这一年年底他以“核时代的想象力”为题，连续进行十一场演讲。他阐述了核时代的两个悖论。

悖论一：一方面是向敌国大力宣扬核武器的威力，声称瞬间可以歼灭几千万，以达到有效地恐吓与震慑敌国国民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对于自己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对于被关在核武器基地的冲绳日本人又必须宣传说：“不，核武器没那么可怕，我们能够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极力淡化核武器的危险性，以防民众暴乱。所以大江要求民众必须深刻洞察核武器的悲惨性，而不是它的威力，并对其保持强烈的想象力。

悖论二：核能的开发固然诞生了新的能源，但同时也意味着大量屠戮生命的技术的诞生，这就是核开发与核武装之间的矛盾。大江肯定在人类生命的新要素中增加核能的意义，不过他指出，要推进核开发，就必须彻底废弃核武器杀戮的一面。但日本令人堪忧的现实是，那些以政府之力推进核能开发的人，恰恰是热切盼望冲绳能够带核回归的人！佐世保的美军核潜艇产生异常放射能，结果美国认为它与潜水艇无关，而日本政府则坚决否认本国拥有核潜艇。所以

要坚决反对核武装，遭受核轰炸的日本民众必须以日本人的名义，能够切实地用自己的手亲自去检验日本绝对没有进行核武装，与那些对核轰炸的悲惨后果没有知觉的人、片面强调核武器威力与核能威力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然后才能找到核能开发的正确途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欧洲和日本反核浪潮中，大江健三郎随同少数日本作家到欧洲访问，他在《从广岛到欧洲广岛》（1982）一书里记录了欧洲知识分子的反核反战运动，以及他认为从中可以借鉴的经验，对日本未来的核政治进行了设想。《核之大火与“人”的声音》（1983）是他驱遣文学家的想象力、为对抗核危机而对世界进行构思规划的成果。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他又写下随笔《广岛的“生命之木”》、长篇论文《“广岛的心”与想象力》。此外，他还参与编辑“原爆文学”，并且把反核思想融入虚构的小说世界，同时串联起神话、洪水、暴力，以及救赎、牺牲等象征性意象。如《洪水淹没我的灵魂》、《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等。2004 年，与同道者加藤周一、井上厦等人结成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九条会”，书斋内外都展开历史批判和现实政治斗争。

在大江看来，对核战争的悲惨后果要每一天、持续地发挥最为丰富的想象力，这是抵御核战争的第一要务，否则不足以产生强大的抵抗力量。“核时代的想象力”的提出，与大江个人精神成长和他的生存时代有关。大江智障长子的诞生和他的广岛之行使他找到了超越危机的“自由的想象力”；与此同时，日本和美国在处理广岛、长崎问题上展示出的自私自利逻辑包含有强权、暴力和反民主的实质，而战后的日本国民又不停地歪曲历史记忆，缺乏反省的自觉。在如此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大江健三郎以为：对民族主义、民主化、民权、文化多元性的思考必须被置于一种广泛的关系网络和历史脉络中才能充分呈现出来，对任何一方面的思考都将连带着对于另一方面的思考。没有这种广泛的视野，就无法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就有可能堕入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而毫不自知。

四

对于中国进行核试验，大江健三郎同样展现出开阔的视野和宽容的襟抱。

大江健三郎对 1949 年 10 月成立的新中国寄予了美好期待，认为它展示了人类政治思想的崭新形象。但是 1964 年 10 月中国进行核试验之后，大江认为中国原有形象已遽然改变，成了与核为伍的另外一种国家，这让他颇为失望和纠结。他质疑道：一个国家拥有了新式核装备之后，反而说有可能导致核武器的全面

废除——在这样一个政治年代，无异于一个童话。为了平复内心的矛盾，在1967年萨特访日之际，他向萨特这位一直给予他思想养分的文学前辈、也是战后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反核理论并介入现实斗争的思想家寻求确证。萨特给了他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正因为中国长年生活在美国的核威胁之下，为了对抗美国的核武器，中国必须拥有核武器——这就是事实。既然法国人萨特反对法国及所有国家的核武装，却不去全面否定中国的核试验，那作为日本人的自己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反对呢？于是他接受了核试验成功是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最辉煌成果之说。

问题在于：即便像大江健三郎那样驱遣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也没有料想到，在令人堪忧的核战争来临之前，日本发生了千年不遇的大地震和海啸，并且由此引发和平利用的核的泄漏！日本核恐慌的事实证明核能安全神话的破灭：人类根本不具备处理核危机的能力，根本没有掌握核废料最终处理技术。接下来的可怕后果是，人类居住的美好家园就有可能成为核废幽灵栖息的深谷！

在此之前，美国、苏联、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等国都发生过严重的核泄漏事件。谁能保证，唯独中国永远不会发生？！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当日本的核泄漏危机触发全球新一轮反核情绪的蔓延时，中国大多数是在作壁上观，更有所谓的核电专家站出来指责“反核主义”是出于偏执的恐核心理，是一种“狭隘的和平主义”。故此，面对大江对中国进行核试验的矛盾与纠结，我无法做到坦然和释然。在使用核能这种具有毁灭性力量的物质时，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理性和爱心，如果我们被仇恨和贪欲挟制，我们终将遭到报复。广岛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将失去权利，除非世界对核态度能够经历脱胎换骨的改变。单纯地歌颂核的美好与正义的一面已经没有意义，因为被歌颂的人或者物有可能犯下谋杀人类的罪行，而这些罪行往往正是在追求纯粹与至善的名义下实施的。因此，广岛之后大江的写作没有向我们允诺美好和幸福，他只是以文学受难者的姿态展现出清晰的痛苦、反省和批判。

就在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畅销日本的1965年，吉本隆明批判以广岛遭受核轰炸为素材的大江有“异常趣味”，并且以文学的名义批判文学家大江在广岛问题上的政治性发言。大江健三郎的主张是：“我不同意在政治面前文学无力的看法；我不怀疑透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的看法。”这位文学家出色地解开了文学与政治的缠绕。

3·11东日本大震灾之后，地震、海啸、核泄漏将为人们的思考带来怎样的改变？日本将往何处去？日本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这一系列问题必将使日本的文学界、思想界、宗教信仰和哲学领域面临严峻挑战。有报道称：“东日本大

震灾唤起了日本宗教的觉醒。”日本不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神的沉默”、“神的责任与人的自由意志”等问题恐怕不会成为讨论的主题。但是，如果日本仍然延续明治维新以来经济至上的思想，以军事优先理论支配国际关系，贪婪地滥用核能，它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现代的普罗米修斯被绑在荒无人烟的岩石上，遭受放射性袭击？而作为邻国的我们是否也仅仅是幸灾乐祸地隔岸观火？那么要遭到怎样的毁灭才能让我们转过头来，殷殷垂注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美丽而脆弱的地球？

（选自《天涯》2011年第5期）

切尔诺贝利：他依然没有撤离

苍耳

近段时间，媒体上连篇累牍地重新解读切尔诺贝利，这固然必要，但仅仅物理性或事故性地看待切尔诺贝利，那么我们距离这场悲剧的“堆芯”只能越来越远。这不能不令人悲哀和黯然。如果百分之八十的死难者本可以逃脱死神，如果更多的“辐射人”本可以健康地活着，如果……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切尔诺贝利？当然，如果不是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切尔诺贝利这个怪怪的名字，便如同传说中那人面兔身之讹兽一样，会慢慢隐没于记忆的荒野而不再狰狞毕露了。“讹兽”别名诞，据《神异经》载：“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二十五年来，切尔诺贝利对于我，只是一个遥远的地理名词，类似早年的一个梦魇，一个神秘兮兮的城堡似的存在物。它从不带有“现场”、“真相”、“正在”的意义，因为一切都被封存了。这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比如爆炸后的四号反应堆必须套上石棺，三十公里内必须划为绝对禁区，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它曾被一只无形巨掌打上封条，包括所有档案、胶卷、病历、死亡证明、知情者的嘴巴。

不管怎么说，从爆炸发生那一刻起，“切尔诺贝利”就一直在往下“切”，一直在锋“利”，并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夜倒悬在我的头顶！当辐射尘埃随着大气飘散到东欧地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半个地球上旋转着“切”出创口时，苏联政府仍伶牙“利”齿地狡辩，刻意隐瞒不报。据戈尔巴乔夫回忆，爆炸发生后，他被告知只是一般失火，“过程跟煮红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这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和举重若轻的忽悠，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前党首戈尔巴乔夫这样说，就可以将历史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那么，到底谁在骗谁？是下骗上还是上骗下，抑或上下瞒骗惯了而继续互骗？但他们上下一致地欺骗了整个世界。这是铁的事实。

核事故发生两天后，莫斯科才派出一个调查小组抵达现场，但不知什么原因竟迟迟不提交报告；直至三天后，莫斯科得到瑞典政府发来的质询和数据，这才知道事情不妙，辐射云已随风飘散到瑞典，事情远非“跟煮红茶没两样”那样简单。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忙于与西方军备竞赛，他必须设法捂住“切尔诺贝尔利”喷射的核尘埃。也就是说，对戈氏而言，倘能割除“切尔诺贝尔利”的两端而取其中，才符合政治家的最大利益，这样便接近“诺贝尔”了——他早该获“诺贝尔和平奖”了。但“尔诺贝”毕竟不是“诺贝尔”，铸剑为犁更不是铸犁成剑。

一九八六年四月之末那个黑色礼拜，第一个赶往出事点的俄新社记者伊戈科斯汀，冒死搭乘直升机，盘旋于第四区上空，在距爆炸洞口仅五十米处快速拍摄，现场比墓地还要悲凄、荒寂，那喷射死焰的巨大裂口让人立马想到什么才叫“自掘墓穴”，什么才叫“世界末日”。机师连呼辐射读数太高，只能滞空四十秒。然而，伊戈科斯汀没想到的是，拼死拍下的十二张相片因辐射太强而完全变黑，显不出任何影像了——更不幸的是它成了一个可怕的征兆和隐喻：整个核事故真相也遭到另一种核辐射而全部变黑，报废般地被锁进无形的暗箱之中。二十五年后，我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伊戈科斯汀，我正在穿越的历史隧道突然灯火全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的嘴巴被强行塞进一股浓浓的怪味——

“嘴巴里有金属味道，一种酸味。人家说辐射没有味道，我们之后才知道，那是放射性碘的味道。”当年用仪器测试辐射的克伦班亚克上校回忆道。

如果这时官员告诉你，根本没有什么怪味，你的鼻子一定有问题，你怎么办？如果你继续申辩：我明明闻到了一股怪味，为什么你们偏说没呢？他们会说你脑子有问题，可以送精神病院了。

一个让我震惊的细节是：明明在现场和周围测出远超致命量几百倍的核辐射，而且还在不断升高，可是专家却宁愿相信测量仪出了故障，也不愿相信发生的高辐射是真实的。至于高辐射值导致测量仪破表时，专家甚至相信高辐射消失了。在专制思想操控下，科学、专家以及科学仪器也都变质变味了，甚至成为反科学的御用工具。

然而，四月二十六日凌晨时分，第一批赶赴爆炸现场的六十九名消防队员，在未被告知真相的情况下毫无防护地投入战斗。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像被命中的弹靶一样接连倒下，有的剧烈呕吐，有的失去知觉，有的面目全非，现场惨不忍睹。结果三十一名队员死于直接核辐射，其余的都患上了急性放射综合征：眩晕无力，间歇性呕吐，皮肤生疮化脓，整块脱落，骨髓退化，多个器官受损，

以致心力衰竭。战士们以为面对的只是烈火，却不知道真正凶恶的敌人是看不见的，远比当年德国法西斯厉害千百倍，而最大的蒙面杀手却是背后高喊“同志们冲啊”的巨大阴影……事实上，苏联最高当局完全清楚，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远比真正的战争更为惨烈和棘手，否则他们不可能从阿富汗前线抽调顶尖飞行员，连续不断从高空朝反应堆裂口投下八十公斤沙包，指望用大量的沙子和硼酸把大火闷熄。一个飞行员每天飞行三十多次，每次飞行会吸收五到六伦琴辐射。在半年时间里，据称有六十万人参与到这场特殊的战争中，不计其数的无名英雄丧命于此。俄新社记者伊戈科斯汀追忆道：“戴面罩的士兵在四号机组抢险，每次停留不能超过四十秒，每人铲不了三次就得离开，那场面就如战争一样。”正是因为他们，才避免了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十倍的第二次爆炸。

核事故第一天，在距核电站三公里的美丽小镇普里皮亚季，尽管四万多居民已吸收了超过正常值五十倍的辐射，但他们依然生活在阳光灿烂的蒙蔽之中。凌晨爆炸伊始，普里皮亚季从睡梦中惊醒；第二天他们被告知，只发生了小事故，核电站是安全的。没有人告知他们必须紧闭门窗、服用碘片以应对。直到四十八小时后，政府才开始疏散受到高辐射的居民，但仍然没有透露疏散的原因。此时河水已浑浊不堪，冒起怪味的水泡；两岸边大片大片的松林、白桦林被放射性气流灼成焦黄色。

匪夷所思的是，事故发生第六天，苏联当局居然筹备了“五一”劳动节盛大庆典，想以此掩饰核事故的严重程度，进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当然，权威的《真理报》在第三版底部发布了一则消息，声称“危机已经过去，现在没有任何危险了”。尽管标题很小，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它足以给恐慌的群众吃一颗定心丸。被洗脑的群众是最听信“真理”的。在距切尔诺贝利一百三十公里的基辅，“五一”节那天，辐射值是正常值的几千倍，当局依然鼓动群众参加劳动者大游行——红旗飘飘、彩色气球、高呼“苏联万岁”的人流、鲜花的海、呼啦啦的鸽群、天使般的笑容……无论怎么想象也无法将这场面与地狱、死亡联系到一起。然而，冷面无情的畸形政治导演的正是一幕巨大的荒诞剧！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场庆典中遭受戕害并踏进地狱之门。记者伊戈科斯汀拍摄了“死亡游行”的画面，但奇怪的是，这些资料竟也从乌克兰国家档案中蒸发了。

如此看来，切尔诺贝利绝不仅仅是一个悲剧现场，它其实是一个看不见的隐蔽杀手，一个没有命名的祭台，一个以花豹斑点式向外扩散的无主动词！那么谁是祭品呢？这是不言自明的。他们的亡魂至今仍在切尔诺贝利徘徊、呼号。如果换一种说法便是：“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想想看，连遥控机器人清理核污